

中国公司治理二十年学术研讨会南开举行

12月15日,“中国公司治理二十年学术研讨会”在南开大学商学院举行,来自国内外知名高校、研究机构、企业单位的300余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共同梳理探讨中国公司治理发展历程与未来趋势,并就促进提升我国公司治理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建言献策。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党组书记、中国上市公司协会首任会长陈清泰,南开大学党委书记杨庆山,中国证券业协会党组书记安青松,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黄群慧,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副主任郑东华,深圳市公司治理研究会会长王绍宏等特邀嘉宾,以及美国莱斯大学琼斯商学院教授张燕、中山大学管理学院教授李新春、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学商学院终身教授崔鸿等特邀学者出席会议。开幕式前,杨庆山会见了来宾。

杨庆山在致辞中指出,改革开放40年来,公司治理作为一门二级学科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南开大学中国公司治理研究院是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20年间,其在公司治理理论研究、学科建设、人才培养、服务社会等方面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南开大学即将迎来百年校庆,希望中国公司治理研究院秉承南开爱国传统,进一步扎根中国大地,聚焦中国企业管理的重大现实问题,进行战略性、创新性研究,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郑东华说,正是由于广大中国学者善于学习、善于创新,才得以使理论研究在与中国改革开放伟大实践进行赛跑的过程中,取得

丰硕成果。南开大学中国公司治理研究院始终活跃于中国公司治理改革实践和公司治理理论研究的前沿,进入新时代,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将与研究院达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共同为全面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推进国有企业向世界一流企业迈进提供智力支撑。

王绍宏介绍了深圳市公司治理研究会与南开大学中国公司治理研究院开展研究成果转化的相关情况。他表示,深圳是我国改革开放的窗口,2017年,双方达成合作,首次将南开治理指数应用于区域治理评价,今后将继续与研究院深化合作,致力于进一步提升深圳市上市公司的质量。

开幕式上,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与南开大学中国公司治理研究院进行了合作项目启动,双方将共同开展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治理与市值管理评价研究,并连续发布年度报告,为国资委监管职能和模式的转型以及我国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治理水平的提升提供支持。

在研讨环节,三位特邀嘉宾分别立足多年从业经验与观察,从国有企业体制改革、国际化进程、特色实践等作主题报告。

陈清泰以“重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为题,沿着历史脉络阐述了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命题。他认为,国企深层次体制问题最终要靠企业制度解决,因此,要深刻认识理解“建立现代化企业制度”的初衷和现实意义,明晰“管资本为主”的做法与结果,同时有必要科学界定“国有企业”,以把握企



业转制的方向。

黄群慧以“中国国企改革四十年的基本经验”为题,聚焦中国国有企业与世界接轨。“国有企业若想成为世界一流企业,需要过‘改革’、‘管理’、‘竞争’这三关。”黄群慧认为,在全球化进程和中国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国企应通过学习世界一流企业的管理经验和成长规律,逐步提高自己的管理能力,并以“贸易战”等国际竞争作为改革发展的动力。

安青松主要介绍了“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的实践特色”。他表示,公司治理是改革开放的重要制度成果之一,也是资本市场基础制度的一部分。“由于资本市场信用基础主要是建立在公司治理结构与信用披露制度之上,因此,公司治理是资本市场发展的两大台柱之一。”

三位特邀学者也从自己的研究领域出发介绍上市公司领导人角色、家族企业的发展特性、公司治理的新机制等最新研究成果。

张燕揭露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公司首发上市前通常会更换CEO,并进一步探讨了CEO更迭与IPO估值的关系。

李新春聚焦“家族企业治理的现代转型”,介绍了家族企业的治理模式,“通常好的家族企业,都同时拥有治理家族与治理企业两套机制。”

崔鸿以“竞争与合作”作为动态统一体,介绍了“竞合互动,对公司治理研究的启示”。

在总结报告中,南开大学中国公司治理研究院院长李维安作“中国公司治理发展与趋势”主题报告。他表示,经过多年的发展,公司治理改革历经结构建立、机制完善、有效性提升等阶段,取得了重要进展,并已经渗透到管理的重要职能环节,如营销治理、供应链治理、财务治理等。伴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公司治理理念日益深入,公司治理实践探索推动了中国企业和经济的健康发展。中国公司治理未来改革发展的方向是尽快突破

“胶着期”,实现从行政经济治理向经济型治理的转型,加快我国公司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

据悉,此次会议由南开大学中国公司治理研究院和南开大学商学院共同主办,由天津财经大学中国公司治理研究院、浙江工商大学公司治理研究院、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会公司治理专业委员会和深圳市公司治理研究会协办。

南开大学中国公司治理研究院的前身是南开大学公司治理研究中心,成立于1997年。作为公司治理领域唯一的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拥有全国第一个公司治理专业硕士点和博士点,发布第一个中国上市公司治理指数(CCGINK),设立我国第一个公司治理专业学会即公司治理专业委员会。截至目前,研究院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国家社科重大招标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和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项目总计148项,累计发表学术论文2084篇(其中英文论文143篇),出版学术著作307部;培养硕士生238人,博士生249人,博士后40人,以及数百名EMBA/MBA等高层次应用人才。2017年7月,研究院发布全球首份《绿色治理准则》;2018年9月,发布首份《中国上市公司绿色治理评价报告》与首个中国上市公司绿色治理指数(CG-GI),引起各界广泛关注。

南开大学商学院负责人出席活动。

(蓝芳)

若要稳定信心,稳定预期,不只是需要决策层的隔空喊话,更重要的是针对当前市场普遍担心与质疑的问题做出根本回应,才能起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

10月13日,笔者在北京参加了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年会,并主持“稳预期:宏观政策如何破局?”这一圆桌环节。笔者将讨论中的一些重要话题进行如下梳理,以期为理解当下中国经济、稳定预期提供帮助。

预期不稳的原因何在?

当下稳预期的重要意义被频频提及,决策层关于稳预期的表述也纷至沓来,如近日央行行长易纲表态“杠杆已经稳住,货币政策工具还有相当空间”,证监会主席刘士余提到“春天已经不远了”,财政部部长刘昆表示“更大规模的减税、更加明显的降费措施”均是代表。但若若要取得稳预期的成效,笔者认为,除了决策层的积极表态以外,还需要深入发现当前预期不稳的重要原因,对症下药,才能有的放矢,取得良好效果。

笔者将当前市场信心不稳的原因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经济数据缺少信任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副所长陈道富提到,今年宏观经济数据与预期出现了较大背离,大家关注的消费、利润等指标都出现了统计上的调整;法巴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陈兴动提到,其在与投资者讲述宏观经济时,被问到的最多的问题是中国经济究竟增长了多少,以及中国经济增速连续12个季度在6.7%-6.9%之间是真实可信的吗?而笔者曾在FT专栏文章《国进民退还是数据造假:工业利润之争》

中,对工业企业利润数据存在偏离到底是因为统计谬误还是幸存者偏差进行过深入讨论。可见,当下无论是投资者还是依靠数据进行决策的政府人士,对数据的质疑并不是孤例,而一旦统计数据缺少了信誉度,有效投资与决策便成为了空谈。

二是对政策方向感的模糊。例如,在民营企业的地位方面,近期有关民营企业生存问题引发广泛讨论,也凸显了民营企业对于前景的担忧,造成这种担忧的原因,与近两年来宏观政策对民营企业的负向影响有关,如环保政策、去杠杆政策、去产能政策、税收补缴政策等;华融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伍戈提到,当前中国经济动能不一定差,关键在于旧的激励机制被打破,新的激励机制客观上还没有形成,民企激励是什么尚不清楚,不敢做大做强。

在房地产政策方面,当前整体基调是抑制泡沫,但野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陆挺认为,棚改政策导致三四线城市房地产火爆,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大的刺激措施,但是由于居民资金总是有限的,且PSL量也不能无限扩大,因此未来可能也会是一个风险点;华融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伍戈认为,房地产行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行业,打压房价、限制房地产融资,是有风险的。可见,有关房地产的政策方向,目前也是分歧较大。

此外,在基建方面,今年上半年,在去杠杆与财政强约束的背景下,不少地方政府投资受到限制,如今政策转向稳增长、补短板,不少前期暂停的项目又重新上马,加快审批,这对于地方政府预期以及绩效考核目标,也难免造成一定混乱。

三是对待政策效果存在质疑。在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不容乐观的背景下,决策层推

出了稳增长的措施,主要还是以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及积极的财政政策为主。但就政策效果,目前各界并没有特别乐观的预期。在论坛上,陈道富提到宏观调控政策效率下降的事实,他认为当前货币政策相对比较宽松,但货币宽松并没有传导到M2,也没有传导到实体经济。另外,财政的拉动效果也在快速下降,即使基建投资,在财政收入比较好的情况下,拉动效应也不大。

四是对外部环境恶化没有充分预估和准备。论坛与会专家普遍认为,国内对贸易摩擦的认识准备严重不足,被动接招,是加剧市场恐慌的重要原因。陆挺提到在今年2月,美国真的开始对华制造贸易摩擦冲突时,国内仍没有意识到风险,在去杠杆方面,节奏也没有适当慢下来,甚至有进一步收紧的趋势,导致二季度经济问题和矛盾更加突出;而据笔者观察,当前国内不少讨论并非是靠完全信息、客观中立报道做出的判断,而这不仅会造成形势误判,也容易加剧恐慌。陈兴动提到,当前国内需要一次大规模的讨论,笔者深以为意。实际上,笔者今年与海外投资者接触,发现国内投资者相比于海外投资者更为悲观,便大致说明如此。

宏观政策如何破局?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越来越清晰的意识到,若要稳定信心、稳定预期,不只是需要决策层的隔空喊话,更重要的是针对当前市场普遍担心与质疑的问题做出根本回应,才能起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针对上述四大影响预期的原因,笔者认为应该从如下几个方面做起:

一是夯实数据基础,为决策提供可信的第一手资料。正如上文所提,造成当前预期混

乱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数据的可信度正在下降。对于投资者与企业家而言,不确定性意味着投资决策的迟疑;对于政策制定者而言,扭曲的数据可能会造成方向性的误判。因此,进一步夯实数据基础,对公众质疑比较多的领域进行充分的沟通与引导,加大数据透明度;对相互打架的数据进行深入剖析与释疑,是未来统计部门应该积极努力的方向。同时,鼓励民间研究与数据科技发挥作用,多维度、多视角的阐述中国经济图谱,为全面理解中国经济现状提供依据。

二是加快供给侧改革,稳定政策预期。对于民营经济、房地产政策问题等诸多方面认识模糊,也是预期不稳的重要原因。论坛的普遍共识是,未来应该进一步深化供给侧改革、贯彻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各项重要决议,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到决定性作用。针对民企担忧自身地位的问题,未来在落实去杠杆、去产能、环保加强与规范社保征收等政策的同时,应更加注重民营企业的合理诉求,加强政策的协调,并切切实实做好过渡性安排,防止“国进民退”成为民营企业家的痛点。

针对房地产政策,市场也有疑问,在经济下滑之下,房地产是否会面临政策反复,重新成为稳增长的主要动力,进而加剧新一轮房价上涨?之所以有这样的预期,其实不足为奇,在过去几轮稳增长政策中,房地产都是重中之重。但在笔者看来,当前决策层已经深刻注意到中国高房价的各种风险,针对房地产的调控措施没有改变的迹象,目的在于扭转政府为房地产背书的期待,因此,房住不炒的政策前景仍然是清晰的。

三是加大减税,以破局中国经济。根据笔者观察,当前货币政策确实存在着政策效应递减的问题,原因在于:一方面,从资金需求

端来说,当前诸多企业债务负担较重,利息成本增加,盈利能力下降,实体经济贷款需求疲软;另一方面,从资金供给端来说,银行以往更加青睐于将信贷资源配置在房地产与融资平台,而当前房地产项目信贷受限,基建投资虽然资金需求旺盛,但地方债务负担加重,且项目投资回报周期长,当前银行风险偏好仍然较低。

从这个角度来说,未来宽松货币政策的效果可能有限,财政政策是重点发力方向。而在具体政策工具选择方面,正如笔者在FT专栏文章《中国经济解困之道—减税优于基建》中提到的,虽然结束基建负增长的局面对于稳定投资有所帮助,但倘若再度掀起一轮基建潮,也并非良方,不仅可能进一步增加政府债务负担,让前期去杠杆以及加强财政约束的努力遭遇挫折,也可能会因为基建投资对促进经济增长的边际效益越来越小,从而难以取得预期效果。解困中国经济,加大基建不如切实减税,还富于民。

四是对贸易摩擦升级做好政策储备。最近中美在南海的冲突加剧,美国副总统彭斯最新演讲直接对中国的贸易问题、南海问题、台湾问题大加指责,并称中国干预美国国内政策和政治,中美博弈已超出贸易本身,甚至出现冷战担忧。对待贸易摩擦,一方面要意识到,贸易摩擦影响不容小视,一旦2000亿商品关税从10%升到25%,其对投资前景、企业家信心,产业链以及上下游行业的影响将十分深远。正如易纲行长近日提到的,对问题的深刻认知有助于我们做“最坏的准备”。

另一方面,对待贸易摩擦也无需谈虎色变,可以充分讨论,广泛决策。正如论坛中大多数专家谈到的,更加开放的中国市场对于海外投资者仍然具有巨大的新引力,中国具备整体成本低廉、完整的产业链,以及巨大的消费潜力等比较优势仍然是抵抗贸易摩擦的重要砝码。做好自己的事情,在加大进口、降低关税、市场准入与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做出改变,即是外部诉求,更是中国把握“二次入世”、把外部压力转化为发展动力的题中应有之义。

在改革开放逐渐进入改革的攻坚期,深水区,作为基础的收入分配制度也就成了攻坚克难的突破口,可以说,进一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建立社会公平的基础。

12月18日,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等出席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

经济制度对很多人来说是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简单地来说,经济体制包含着资源占有制度安排、资源配置的制度安排、经济运行的支持系统。而这其中离我们生活最近的便是资源配置的制度安排。在过去的40年

间,我国的资源配置制度,特别是收入分配制度所面临的问题之复杂,所走过的道路之曲折,所承载的使命之沉重,所发生的变化之深刻,所取得的成果之显著,是世界范围内十分罕见的。

建国初期,由于刻意追求公平,出现了企业,个人吃“大锅饭”的平均主义。十二届三中全会一改不合理的分配制度,开始建立以承包为主的各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使权、责、利相结合,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利益相统一,职工劳动所得同劳动成果相联系,极大地激发了劳动人民的热情。之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我们开始认识到,肯定按劳分配以外的多种分配方式是鼓励创新,鼓励发展的重要举措,而鼓励了除按劳分配外的其他分配制度,也是探索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分配制度的一大进展。

而今,我国基本形成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收入分配制度,并允许和鼓励生产要素参与分配。收入分配制度自改革开放后走过了40年春秋,整体而言,收入分配制度从最初的简单公私分家走向整体通盘考虑,从城乡差异走向统筹规划。其实,我们可以从个税改革一窥收入分配制度的变迁。今年年中更是个税更是再次上调起征点,并明确强调调低,扩中,调高。40年来,随着收入水平的不断上升,个税的改革不断地向前推进,靠着累进的税率个税改变影响着居民可支配收入,刺激着居民的生活消费。同时,个税还能够平衡收入的不均,改善贫富差距。尤其是我国常年居高不下

求。

然而,税收的收入再分配效应是体现在收税的累进性与平均税率两方面的,以不断提高的起征点为切入点来看,一方面,起征点的不断提高,很大程度增加所得税的累进性,从而使收税更多地来自于富人;但另一方面,免征额的上升又带来平均税率的下降,反而造成了整体社会税负的下降,即减轻了整体税收规模。数据显示,我国有近40%的人月薪收入依然低于之前的起征点3500;这意味着新个税的调整仅仅是减轻了中高收入人群的压力,而对低收入者影响甚少。不过,即使不少证据证明了此次改变一定程度抑制了收入的再分配效应,但出于对中产阶级以及国内消费能力的保护,起征点的提升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还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除了个人层面,企业层面同样也在不断地探索;营改增的推行,不仅完善了流转税的体制建设,同时也加深了社会相关产业的协同互联。而更重要的是,随着企业相关税收的改革极大地促进了国有民营之间的公平竞争。

其实,不管是单项还是整体的税改都代表了国家对社会公平考量。当然,税改仅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缩影,但足以证明收入分配制度在深化改革中的重要地位。而在改革开放逐渐进入改革的攻坚期,深水区,作为基础的收入分配制度也就成了攻坚克难的突破口。可以说,进一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建立社会公平的基础,是推进小康社会完善的关键拼图,也是进一步发挥市场经济活力的必经之路。

收入分配制度或是深化改革的突破口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应用经济学博士后 盘和林